

孤憤草
初喜集
合稿

錢來蘇著

孤憤草
初喜集
合稿

錢來蘇著

目 錄

卷頭語·····	一
太微六十自狀·····	二
我的家庭及瑣事之記載·····	四五
孤憤草·····	八九
初喜集·····	二九五
附錄 一九三七年以前佚詩·····	五五

卷頭語

(一) 這本詩集是從我出來抗戰的第二年開始的，一直到現在，即起自己卯，止於戊子。在這十一年裏，共寫了兩千多首詩。十一年可分為兩期，第一期是在外邊（二戰區）作的，共得六百餘首。第二期是到延安後作的，共一千四百首強。集名孤憤草，取這個名的意思謝老序文裏說得很清楚，但他只說到一方面，而另一方面還有蔣閹賣國集團在抗戰的時候對日寇總是企圖投降、割地求和，而對內却是擴兵挑畔排除異己，只知自私自利，國家民族則皆棄而不顧，這亦是我發憤的原因之一。日寇投降抗戰的對象已消滅了，自然是件喜事，那個時期我說從此不吟孤憤草了，詩還繼續在作，所以又起個名字叫初喜集，誰知沒喜過幾天，蔣賊又撕毀了政協決議、停戰協定、四項諾言，而發動全面的大內戰。甚至賣國向美求援，倚靠美元、美械來屠殺中國同胞。這一時期詩中是充滿了憤怒，看不出一點的喜氣來，所以這本詩集仍冠以孤憤草的名字。而初喜集則僅在集中存其名，以表示日寇投降後之所作而已。

(二) 我在抗戰以前的詩並不多，從十五六歲起至五十四歲止統共才寫了二百多首詩，名懷蓮室詩存，其中有反滿清、反專制、反袁、詠時事、斥漢奸、詠史、詠物、贈別、自壽等作。並一些桃色的詩，共訂一卷。此外還有文稿四卷，其中是公牘、私札、雜文等等。這些詩文稿，我

出門時都扔在家裏，存燬不可知矣！

(三) 我十一歲開始學作詩，那時是作試帖詩，從五言二韻至五言八韻；戊戌維新停止科舉，試帖詩不作了，又學作古詩，五七絕作的較多，五七古次之，律詩沒作，現僅存十五歲作的七絕兩首，七古一首；四十五歲到五十四歲這十年裏詩作的多些，但律詩亦僅作了五言的十四首，七言的十一二首而已，這些都錄在懷蓮室詩存裏，孤憤草中僅把記得的五十自壽五首補錄了進去。抗戰後，在二戰區請纓不許，無所事事，憤而爲詩，這才真正作詩了。各體都作過，律詩則居第一位，而且開始學填詞，到延安後，又學作白話詩。總而言之，我的詩尚未作好，正在學，還不成其爲詩，那裏會說到「家」呢？有人曾管我叫「詩家」，這真是對於詩的侮辱。

(四) 這本詩集，只是寫「我的詩」，並無標榜門戶。我生平雖最喜唐之杜工部、白香山，宋之陸放翁三家的詩，這是因爲他們的人品高，有骨氣，愛國家，有中國人氣味，而不是僅喜其詞調，而來篇摹句擬。我的詩集裏，沒有擬古之作。

(五) 古書云「詩以言志」，什麼是志？就是心之所向，由其出發點至其終點，堅定而不移的，這就是志。詩，就是用來表現這個心之所向的韻文。那末我的詩所表現的志是什麼呢？前半部可以說是志在抗戰。後半部可以慚愧地說是志在革命吧。前後總起來說都是以我的庚辰年所作的「老夫謠」爲出發點的。

(六) 我詩的嬗變：詩是表達性情的，我是粗豪性一路的人，所以我的詩的表現，亦是粗

豪，可是在外面不能暢言無忌，否則將有文字之獄，那就不能不事隱諱，而來加以雕琢。及到邊區後，這裏是言論自由的，所以復變成直白的詩。但無論它是雕琢，是直白，而終是不脫離粗豪的本質。在這本詩集的年份中，是可以看出來的。

(七)我寫詩的技術不高，這本詩集裏，不像樣子的詩，當然不會少的。有人勸我，把它刪減一下。若就詩論詩，那是可以這樣作，但歷史的過程，是聯貫的，倘要刪減一些，那就不免要割斷歷史。所以我仍把它保留，而未接受人家的忠告，我謹在這裏道歉。

(八)我此次出門，並非游覽，從事吟詠，所以手邊沒有帶詩韻。十年來所寫的詩，其韻脚大半都是在模糊的記憶中而捕捉來的，其中有詩韻、詞韻、古通韻、俗韻（鼓書詞、京劇、民曲），只求其能使大多數人念它時，能够韻調順口而已，絕不以一隅之音，強概衆口。乞讀者諒之！

(九)關於詩的定義，新舊詩的分界，新舊詩所必需的技術，詩的體裁（形式）的嬗變，等等。謝老序文裏，說得很清楚，亦很正確。我是作舊詩的，舊詩到現在，市場是比較小了些；但是它的歷史，却是相當的長，二千幾百多年；而且它的花果，已遍植於全國，而為全中國人所接受，所愛好；尤其是唐以來的律詩，它的藝術，已發展到最高點，誠如謝老所說：「舊詩，古人已作盡了！再作，也好不到那裏去了。」舊詩的長處：是在氣魄雄渾，用典切實，字句凝鍊，音調鏗鏘，對仗工整，刻畫細膩，學者往往畢生竭力，不得成就，所以就成了一種所謂「文化人」

的專利品，而不能普及到廣大羣衆裏去。還有些人們，拿它來歌誦當時封建主的功德，因而引起了所謂「開明人士」的鄙視。然單就舊詩的形式，而來區分，那是封建、那是民主，覺得還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。世界——中國，是天天在變着，現在廣大羣衆正在翻身，他們對於文化的要求，亦日益提高，但是舊詩，他們看不懂，而且他們忙於勞動或工作，也沒有許多的閑功夫，來學這「一口咬不爛」的老東西——舊詩。這怎麼辦？於是「文藝大衆化」的口號提出來了。但是怎樣去大衆化？有一些作家們，深思冥求，上天下地，在中國找不着，因而到海外，看見了外國貨，花樣是新鮮的，就把它搬運到中國來用，又或者送到本國工廠裏改製一下拿出來，這個外貨本地造的東西，就給它起個名字叫「新詩」。詩是新品了，但它並不是中國廣大羣衆所喜聞樂見的東西，對它不愛好，不接受。新詩的句子往往拉的二三十字那麼長，或有韻，或無韻（外國詩也都是有韻的，無韻的不叫詩，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），不但大衆們念都念不來，就使知識分子們去念，亦是很費勁的，那還能叫他們朗朗背唱嗎？我想就是請作者本人去背唱他自己的詩，也恐怕未必能順口如流吧？我到延安來，謝老曾勸我改作新詩，我也認爲在這新時代裏，舊詩實有改造的必要，於是亦就摹仿着作了幾首，但自己看來，不押韻的，好像是散文，而又沒有散文那麼流利痛快。押韻呢？又恰像古人所作的祭文，左看右看，簡直不像詩。這怎麼辦呢？我於是也就深思冥求起來，好容易在搜索故紙堆中，才找到了從前的先進作家所說的「舊瓶新酒」，就是舊形式新內容的辦法，我覺得這個辦法很好。何以言之？因爲世事在不停的變，新生的東西，日出不窮，

用純舊式的詩來寫，就包括不下，或表達不出，而廣大羣衆對於文化的要求，又那麼急切，新的形式，一時又產生不出來，爲了必需的救急的精神食糧，那末這種「舊瓶新酒」的辦法，的確是最合時宜的東西。且舉個例子來說：抗戰期間重慶有種刊物——「民族詩壇」裏面有將記集團的嘍囉們所作的新詩，純是假藉着新的外衣，裏頭包藏的卻是極骯髒腐爛不堪的舊東西，來腐蝕人心。字句則堆壘，聲調又澀滯，一行行的長短不齊，好像舊時代的曆書（用紙太不經濟），但是謝老的乙酉中秋詩（詠日寇投降）、丙戌中秋詩（詠月餅喻團結），那兩首舊式詩的內容（語句和意義），真是古人夢也夢不到的新東西，而且通俗易解。此外如毛主席的長征律詩、詠雪的詞，朱總司令在太行作戰的七絕、新墾區的五古，都表示着革命的熱誠、抗敵的堅決，及對人民的愛護，可稱爲中國民族文化的代表作品。那末究竟那是新詩，那是舊詩呢？這難道還不明白嗎？前些日子，我看到了一本蘇聯名著「我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」，它給我以很大的啓示，書中敘述着烏克蘭人民，對祖國是那麼熱愛，對外寇是那麼仇恨，對於自己的村莊、土地、樹木、牲畜一切都表示着無比的親愛，甚至敘述書中的主人，訂婚時古時遺留下來的儀式禮節，是由一個村蘇維埃主席布爾什維克李，作媒人，他（李）對於這個舊儀式禮節，是那麼珍重、莊肅、一絲不苟地來執行着。這說明了什麼呢？就是說：一個國家民族的人們，若是對於他們自己的一切文化事物，不知尊重與珍惜，是不會發出熱愛祖國的意志，保衛祖國的力量量的。我們中國已是不止一次的被異族侵略統治過的，而我國家民族，始終沒有淪亡以亡，也不能說不是我們民族舊有文化

的支持與培養，才發生了抵抗的力量。所以「舊瓶新酒」的辦法，這與烏克蘭人的訂婚儀式禮節，儘管是舊的，但是行禮的主人却是嶄新的，是有同樣的意義。中國的舊瓶子是很多的，如：古歌謠、三百篇、楚騷、漢、魏、唐新舊樂府、唐詩（五七絕、五七律、五七古）、宋詞、元曲（南北曲），民間歌曲、南北小調、京劇、評劇、秧歌、道情、鼓書、影調、夯歌、徽調、漢調等等，從三十字句直到十幾字的句子都有，我想任何孫悟空，一個筋斗能打十萬八千里，也打不出這個圈子了，若把這千八百個形式調子，都加以新的內容來唱，那末，在這救急過渡的期間，也儘够用的了，似乎不必急急於外求，況這些形式調子，又都是中國人民所喜聞樂見的呢！至於舊形式裝新內容的條件，我以為是：對於各式各樣的事物的描寫，都要從新的觀點出發（唯物辯證的），要用活的語句，要用通俗的民間語彙，少用典故，最好不用，要有啓發性和興奮性。氣勢要雄壯，聲調要響亮，音韻要諧調，對仗不必求工，平仄也不必過於講究。遇有重大的或情節繁瑣的事物，最好用五七古、樂府來寫。若用律詩寫，不必拘之於四韻八句，可以把它擴展為六韻、八韻，甚至百韻，都無不可。古人作排律，有至百韻的，但他們只求典雅工整，每用冷字、僻典、儉韻以求勝，這裏可以不要，即押重韻亦無甚關係。就是用舊的形式而不要被它所拘束。最要的是以新的觀點、新的詞句，深入而淺出的，來寫新生的東西。寫的要人人能看得懂、聽得懂，有管弦能唱，無管弦也能唱。拿中國民族的舊形式和調子，來歌唱我們人民大眾的新事業，並為他們服務。新形式的創造，我不反對，我正在等待着，我也正在思索着。我這一偏之見，還請讀

者不吝教正，至深感幸！

(十) 這本詩集，是讓驥子繕清，經我親手校訂的。我的詩應以此集為準，既存其真，亦使讀者知我寫詩的伎倆，僅僅如此。別人抄本的錯誤，應依此本改正。至經別人引用，而加以改竄的，那只是他的詩，而不是「我的詩」。無論其改竄，爲金爲鐵，我不掠他人之美，亦不代人受過。

(十一) 我的詩集，另有三家鈔本，除此本外，在外邊（二戰區）有關抄本，詩約六百首；喬抄本，詩約五百餘首；陶抄本，約二百餘首，別無鈔本。其他散在各地之作，如北平、天津、保定、張家口、瀋陽、吉林、哈爾濱、營口、海城、復縣、山東、安徽、南京、杭州、雲南、四川等處都有。其中有些已收入懷遠室詩存，及本集裏，其未經收入者，則無從查考了。

一九四九年己丑九月記

(十二) 我在遺傳上說過：我死後立墓，應題「抗戰詩人錢拯之墓」。日寇投降了，而賣國賊及其匪幫，倚靠美援，再次向人民進攻，盜賣國土國權，禍國益烈，我亦跟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，對內外反動派的反擊，又作了不少的詩。在今天抗戰的名詞，已陳舊了，是應該依照謝老的序文改題：「中國共產黨黨員愛國詩人錢拯之墓」，則死有餘榮矣！

(十三) 關於詩之刪定，於上面第七節已經說過，近承諸老同志准予出版，要我自己刪定一下，除將無關宏旨之作刪除若干首外，餘仍其舊。因爲我的寫作技術不高，故作品亦純駁不一，

正如百袖之衣，布帛雜陳，無須掩飾也。

(十四) 關於集名之訂定，此在第一節裏亦說過了，現在日寇已經驅逐，人民解放戰爭已經勝利，大家同在歡慶，所謂孤憤的對象已不存在，故將日寇投降以前的詩，名爲孤憤草。日寇投降以後至蔣賊滅亡之際的詩，則仍以初喜名集，記實也。

(十五) 本集原定爲十二卷，由己卯到庚寅編年爲體，分卷較繁。茲擬以孤憤草爲前卷，初喜集爲後卷，復以時局遞嬗及我個人思想的轉變，因將卷後語改爲卷頭語，庶使讀者一目瞭然。次則僅列總目，詩題綱目，太費篇幅，不要了，以求省約。茲將總目錄下：

一、卷頭語

二、遺傳及家庭瑣事

三、詩

四、附錄

一九五〇年（庚寅）二月重訂

(十六) 這本詩稿，在延安曾託當時詩壇健將貴州黃齊生先生訂正，不幸於赴重慶歸途遇難未果。近兩年又請董老、謝老、王明同志審閱，正慎建國之初，萬政待理，不暇及此，今僅由我自己來刪定它，學識既甚淺陋，精力尤感不足，其中文字與論點當然紕繆百出，唯一希望，至希同好諸君，多賜指教，更請吾黨同志不吝氣地、嚴肅地給予批判，俾免遺毒當世，幸甚，幸甚。

(十七) 於去冬歸來後，翻檢敝篋，舊日詩文稿尚有殘存，這是我十六歲至五十五歲四十年的作品，經過十二年的兵火，敵偽、蔣匪屢次搜檢，其中雖多半散佚，然仍保存了這些，實非易事，摘錄若干首，但年月前後次序已紊，附於卷後，並希教正。

(十八) 這本集子付印，最後商定，所有友人們的序文、筆記、題詞等，以及我的聯語散文，並抗日戰爭的舊詩，除摘錄幾首附之卷末者外，概不付印。

(十九) 這本詩的順序，係用甲子編年，起己卯訖辛卯，這十幾年來，時事變遷，詩亦當然隨之而異，解放後，新中國誕生，改用公曆，因將甲子比附公曆，劃成對照表，以便識別。

公	曆	一九三九	一九四〇	一九四一	一九四二	一九四三	一九四四	一九四五	一九四六	一九四七	一九四八	一九四九	一九五〇	一九五一
甲	子	己卯	庚辰	辛巳	壬午	癸未	甲申	乙酉	丙戌	丁亥	戊子	己丑	庚寅	辛卯

(二十) 這本詩的出版，從文字訂正、規畫商洽、以迄付印，諸承各位先進同志的提示和鼓勵，尤其是謝老同志熱心贊助，以底於成，此外繕寫副本，校勘訛脫，鄭伯翔、韓英諸同志特別幫忙，在此一併謹致深深的感謝。

一九五一年（辛卯）八月續記

太微六十自狀

引言

余生平事蹟，無不可對人言者，但亦無事足誇耀於人。唯行年六十，血氣日衰，自去秋大病以還，精神至今未復，誠恐行將就木，來日無多，則吾此生，究爲何等之人，諒家人子女，亦復不知。來延休養，趁茲殘喘未息，默居斗室，檢點生平，爰略述梗概。若就家庭而論，余誠爲不肖子，至於投身國事，其爲功爲罪，待諸死後而定。但願吾之子女，時時瀏覽斯文，勿墜余一生堅強之志可耳。文雖拉雜無次，然字真句實，絕不敢自欺欺人。

本傳

錢拯，字來蘇，一字太微，又號濟師，晚號洗雪老人。原籍浙江杭縣，清時爲仁和縣，寄居北平，誕生於奉天昌圖府奉化縣，現遼寧省（今遼西省）梨樹縣。此後余三十五年之生活，均寄託於此，故成爲余之第二故鄉。

余譜名啓隆，字叔常，乳名康隣。八歲時，祖父即爲捐監，十四歲復爲捐縣丞。因仇滿，至十九歲，將捐照悉焚燬，乃易今名。祖父名開震，前清記名簡放道，實任奉天昌圖府知府。父宗昌，吉林道署吉林提法司使。兄弟七人，啓泰、啓嘉、余第三、啓恩、啓壽、啓岱、啓福。兩兄及四五兩弟均歿，尙有姊妹二人。

現年六十歲（一九四三），生於前清光緒十年甲申，即一八八四年，六月九日，舊曆五月十六日。是年中法戰役，諒山之戰，中國本已勝利，而清廷昏闇，反割地賠款，越南以亡，由此列強肆意侵略，藩籬盡撤，所謂吾生不辰，與憂患俱來也。幼年家境甚優，先祖先父，均任前清二品大員，當時仍受前清科舉教育，九歲時，因閱讀家藏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供詞，始悉中國被統治於異族，又因當時東三省政治，係一特殊制度，所有軍民兩政，均操於異族大員之手，對漢族待遇尤爲不平，因之民族思想，油然而生。中經甲午中日之戰、戊戌政變、庚子義和團事件，益覺清政窳敗，非推翻滿清，無以救中國。適庚子事變，奉天省會陷落，舉家避難錦縣、義縣，因得接近民間武裝（即俗所謂紅鬍子）首領施五、胡廣義（海峯）等，與謀顛覆滿清，彼等昧於政治，游移不決，又因先父調任蓋平縣，隨赴任所，事遂擱置。

時清廢除科舉，創設學校，十九歲乃赴京就學，考入保定之北洋高等學校。二十歲，自費赴日，入早稻田大學，僅七閱月，值日俄戰役緊張，棄學回國。又考入保定優級師範，此時已先後在日本及國內，閱及新民叢報、浙江潮、民報、復報等，對革命始有較具體之認識。在保定得識革命

黨人吳樾，因益增進革命思想。二十一歲時，清爲籌辦海防，賣官鬻爵，先父擬出資爲謀一知府，以不願任滿清官吏，商得先父同意，乃利用此款，回奉天籌設一輔華中學。一年後因經濟困難停辦。本年與革命黨人商震（起予）、蔣大同會面，時先父任督轅營務處會辦（時總辦爲張錫鑾〔今頗〕，後張昇任，由先父繼其職），招撫張作霖（雨亭）、馮麟閣（閣忱）、金壽山等（時皆爲紅鬍子）。前交識之胡廣義，即在馮麟閣部，由此關係，得結識馮麟閣，及其部將趙嵩齡（峯亭）、張海鵬（仙濤）、汲金純（海峯）、高青山、郭景汾（潤朗）等。並推荐黨人羅鵬，往任教練，以便輸入革命思想。馮降後改名馮德麟字閣忱。

二十二歲，冬，先父奉吉林將軍達桂（馨山）奏調赴吉，辦理新政，余隨同前往，助先父創辦法政學堂，並荐黨人姚劍泉、張根仁（涌初）、劉芳（潤民）等人，入校任教。次年東三省政治改革，設行省，吉林巡撫朱家寶（經田，雲南人）到任後，將陸軍學堂交先父兼辦，又介紹黨人方劍飛、范國才等，充任教員。並結識連承基，及在安徽起義失敗逃至吉林之柏文蔚（烈武）、熊成基、張之屏（樹侯）、王瀾山諸人，時余亦任兩級師範教員。

余兩業師，一陸鐘琦，一朱家寶。均翰林，官至巡撫，陸山西巡撫，朱後調安徽巡撫，陸字申甫，北平人。朱經田到任後，擬委余爲內文案，余以志願從事教育，乃交提學使吳魯（肅堂），先委勸學總所文案官，未就，旋改委兩級師範國文教員。

二十五歲，朱家寶調安徽，陳昭常繼任吉撫，是年冬，慈禱后、光緒先後病殞，功令各機關

學校畢業三日，當撰舉哀通令駁議一文，宣示學生，事爲提學司曹廣楨（梅妨）聞知，因予停職。宣統元年（二十六歲），清廷派員子載振，到東三省查辦事件，經過哈爾濱時，黨人熊成基、商震等謀刺之，事洩，商震逸去，熊成基被捕，解至吉林。先父適任吉林高等審判廳丞，因勸阻受理是案，繼由撫署開特別法庭審判，處決有日，乃與胡廣義、趙嵩齡等密謀劫獄（胡等已由馮部解職，到吉投先父謀差）。不意胡等一面佯諾，一面告知先父（時在次年二十七歲正月十三日晚），先父怒極，以大杖逐余出門，及熊就義後，始經親友勸解，派人押送回保。

當時吉林風氣異常閉塞，愛商之先父釀資設吉林印書館，並創辦吉林日報，余與胡煥（眉仙）、劉德（宣三）任編輯，吉林始有報紙，後以款絀停刊。

在此時期，革命浪潮正在高漲，以爲個人行動，無益於事，非加入團體運動不能成功。適值保定軍需學校招考，遂參加考試。入校後，即秘密物色同志之人，有董佩卿、陳瀛寰、魏子敬、朱光遠等十餘人，是時同盟會保定支部亦已成立，由劉振華、郝仲清介紹入黨，並即選任聯絡部總幹事。得識王國光、張璧（玉衡）、何德輝、孫岳（禹行）、孫楚（草厓）、劉竹坡（汝賢）、王蓬秋、劉雲峯、呂雲鶴、張際五（官雲）、李靈璧（真）、周思誠（敬孚）、王法勤（勵齋）、王秉哲（潛明）等等，期待時機，準備行動。

二十八歲，辛亥，八月十九日（十月十日）武昌起義，各省紛紛響應，清廷震恐，檄調各省軍隊，討伐革命，並調東三省軍隊入衛京師。保定同盟會支部召開緊急會議，選派同志分赴各路軍隊